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有所思

传统儒学在近代的角色与价值

□ 尹传政

传统儒家思想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纳了“天人感应”思想、佛教道教思想以及唯心主义思想等，历经汉代董仲舒的“大一统”，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宋明期间的陆王“心学”的演变，形成了一套以宗法制度为核心，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封建礼仪道德规范，成为中国社会两千年的主流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基。步入中国近代社会，传统儒学的境遇却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西学的传入，传统儒学的主体地位发生动摇并且逐渐沦为近代各种政治力量表达诉求的载体，有时被当作批判和指责的对象，有时受到维护和利用。

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打出反对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旗号的当属洪秀全，目的为号召社会民众参加反清斗争，实现太平起事。洪秀全创建以“拜上帝”为核心，宣传人人平等为主要思想的“拜上帝教”，以实现鼓动更多的社会民众参与反清斗争的目的，但这与长期以来以“三纲五常”、宗族观念为基本内容的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为打破儒家文化主导下的社会思想而建立起“拜上帝”这一新的社会信仰力量，洪秀全从开始就实行了反对儒家文化的做法，如“一夜纵火焚府学及城隍庙”，“每日辰刻礼拜，号曰‘拜上’，毁各庙宇神像”等。定都天京后，为了维系太平天国赖以存在的思想纽带，洪秀全进一步禁止儒家思想的传播。他把孔孟书籍“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还将《四书》《五经》的“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洪秀全虽然视儒家思想为腐朽，但还是承袭了诸多封建陋习，如纳妾和等级制度等，很明显，依然没有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与此同时，洪秀全毁坏、禁止儒家文化的行为还引发了传统文人的强烈反对，如曾国藩就认为，太平天国“皆以兄弟称之”，毁坏了“君臣、父子、上下、尊卑……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秩序，并呼吁清大夫不要“袖手安坐”，从而激起了一个以儒学信仰为基础并组建了军队与之对抗的湘淮集团势力的形成。可见，洪秀全对待传统儒家文化的不当行为成为太平天国败落的一种必然。

在儒学受到内外冲击下，湘淮集团不仅竭力维护儒家思想的主体地位，还试图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对其进一步巩固，以应对外患内忧的局面，挽救清廷的危亡统治。在太平天国大肆毁坏孔孟文化时，曾国藩就曾指出，“此岂独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并要求，“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于是曾国藩推行儒家“礼治”，以“日教民以孝悌仁义之经”；全力恢复太平军占领区内的科举考试，以至“两江人士闻风鼓舞，流亡旋归”等等。面对西学渐盛之势，李鸿章等认识到，“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同时还认为西人之学“竭其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所以要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其目的就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于是，他们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创建新式学堂等，以此完善儒学的“外王”“内圣”功能。但事实相反，儒学思想正统地位随着洋务运动对西学的引入而进一步动摇，并受到时局的严峻挑战。

康、梁企图将西学与孔孟思想相结合，说服近代顽固势力，实现托古改制，改变中国近代被动挨打的局面。洋务运动附带而来的西方民主观以及甲午战败激起的民族意识，与传统孔孟思想产生了强烈的碰撞，引发了19世纪末的社会思想危机。在这种状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借助孔孟旗号发出了社会改革的呼吁。康有为认为，“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主，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所以，他认为，“孟子、荀子都认为桀纣非君，汤武非弑，其道理在于：‘为民贼者，人人皆得而戮之也’”。显然，康有为的本意主要强调，“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而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先王的言行写出来的宣传作品，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改革”。或许正是这种宣传方式，让维新思想一时获得广泛传播，不仅吸引清廷大员纷纷参加维新派筹建的强学会、保国会以接受维新思想洗礼，也令光绪皇帝为之动容，并最终接受维新主张。然而，他们在随后的改革中提出的“废八股，倡西学”方案似乎又让其政治诉求大打折扣，使官员基于传统文化的信仰而对变法产生疑义。这似乎决定了维新变法最终的命运，却开启了近代思想启蒙。

同维新派一样，资产阶级革命试图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传统儒家思想进行结合，使革命理论为一般社会大众所接受。众所周知，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该思想主要来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学说，但孙中山依然从古代孔孟思想中寻找三民主义的理论根源。他指出，“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这是因为孔子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同时，孙中山又依据孔子曾主张的“言必称尧舜”以及孟子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从而明确提出“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显然，这种革命理论的阐释使得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专制王朝顺理成章，但也导致了长久以来建立的传统礼乐制度的崩塌，以致在辛亥革命之后，“任何一方政治势力和知识阶层，都不曾即时提供一个在完整性上足以与传统价值全面匹敌的替代系统”，这使得文化复古逆流趁机而入。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借机大举推崇孔孟思想，打出了“尊孔复古”的旗号，实际目的是为复辟帝制，“不过借祀孔之名，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复活之实”。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观念一度广为传颂，但“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并没有被先进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击溃”，于是，1912年9月，袁世凯发布《崇孔伦常文》，重弹“尊孔复古”的老调，“中国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八德乃人群秩序之常”。很明显，袁世凯此举有司马昭心之嫌，因为儒家思想文化不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也包含了封建专制礼教内容。正如1913年上海《中华民报》发表社论指出的，“因孔氏力倡尊王之说，欲利用之以恢复人民服从专制之心理”，换言之，“在尊孔的旗号下公开进行帝制复辟活动，则是不争的事实”，随后历史也证明了这点。但最终的结果是，即使为“尊孔复古”摇旗呐喊的康有为、马其昶等人面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也提出了异议，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袁世凯本人不但没有实现皇帝的梦想，而且其推行的“尊孔复古”活动还触发了一场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孔运动。

事实上，大张旗鼓地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不止袁世凯，还有由进步变为保守的康有为，他积极成立孔教协会力图恢复“礼崩乐坏”的秩序；甚至连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也在呐喊、助威，“孔教与民国，民国与孔教，均有密切之关系，孔教昌则民国愈固”。这些鼓吹文化复古的行为反倒进一步激发了资产阶级激进派开启思想文化新时代的决心。正如陈独秀强调的，“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在经历了辛亥革命果实被窃以及“尊孔复古”逆流，陈、胡等人深感儒学“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正是儒学和孔子造成了今日中国的落后”，“根本的伦理道德，正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为此，新文化运动领导者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阵地，开始全面涤荡传统文化。陈独秀提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而“何能行于数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时代国家时代”。吴虞更指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等等。显然，主导中国社会千年的传统儒家思想俨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首当其冲的口诛笔伐对象。这似乎预示着，“自20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

由此可见，不管近代的改良还是革命，各种政治力量都无法绕开儒学这个话题，他们的目的都是“由其现实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各取所需，或夸扬其（孔子）保守的方面，或强调其合理的因素，来重新解说、建造和评价他们，以服务于当时的阶级的、时代的需要”。这也足以表明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之大。实际上，即使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较多批评的陈独秀、胡适等人都不得不承认，“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敬的”；“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时人在利用和扩大孔孟思想的政治价值时，不仅带来了传统儒学思想社会角色的转变，也导致其部分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的丧失。

随想录

文化发展需要多元社会评价

□ 赵　瑜

最近我在参与“百位历史文化名人工程”的写作，我写白居易。在写作过程中，研习了很多唐代的文化背景，自己有些体会。

在安史之乱之前，文化建设非常受重视，一个人要做官，首先要考进士，但是考上进士不一定去做官。考进士第一个科目就是做诗，这促使一个人终生都在练习读诗写诗的能力，这种教育的力量很大。另外写诗也有经济价值，比如那时外国人来唐朝拜，有的人会拿着黄金，到长安向文化阶层中的人买诗，白居易就属于当时的大名流。再比如有人刚得到了这些大诗人的新诗，上街买东西时，刚要付款，发现没带钱，他就可以对商家说，他刚从宫里抄出某位大诗人的几首新诗，可不可以换你的东西？商人是愿意换的。

唐朝的文化高峰客观上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财富，这种财富是怎么形成的？是靠真的崇尚正气，厌恶邪的歪的。比如元稹，写诗稍稍淫秽一点，当时就评价不高，被评价最高的就是杜甫。白居易被贬官的时候，一路上往前走，旱路、水路，汉江、长江，要往九江走，这一路上他本来是郁郁寡欢的，但是走着走着就愉快了，因为他发现很多寺庙和客栈，到处都刻着很多诗作，其中有大量杜甫的和他的诗，他就觉得是有很多人肯定他的价值的，是有很多人懂他的。到了江州后，他就写下了《琵琶行》，虽然仍然极其愁闷，但是表达了天涯遇知己的感情。此前他已经写过《长恨歌》，《长恨歌》就是希望当今皇上不要再犯唐玄宗那样的错误，不要君王从此不早朝。白居易经历了五朝皇帝，这些皇帝都是读他的诗长大的，所以皇帝很能接受。他在总结文学经验时，说了两句话，即“文章合为时而著”，不要忘记自己所处的时代，创作要跟时代相关联；“歌诗合为事而作”，有真话才讲，没话不要无病呻吟。他总结的这个文艺理论，在今天依然是很有意义的。

现实主义还有个名字叫写实主义，只要写实，大家会认为这是好作品，不管你写作的意愿是什么。比如徐迟写陈景润，你说他是批判呢还是歌颂呢？徐迟写出了在极左路线下知识分子受迫害的现实，这是批判，但是写陈景润作为坚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在无比艰难的环境下，还在坚持研究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又是歌颂，好的作品是多义的。所以简单的歌颂和简单的批判都不能说明问题。因此如果说批判就是好的知识分子，歌颂就不是好的知识分子，这太肤浅了。

弘扬现实主义精神也包括社会要有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现实主义首先是科学的精神，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应该允许每一个创作者对社会生活发表他的见解，允许他写出引起争议的作品。哪怕大家认为他不是写实，但他自己认为是一种写实就行了，应该有这种宽容的态度。（本文是作者在近日《文艺报》和《人民日报》文艺部联合举办的“弘扬现实主义”探讨会上的发言。）

人物志

少年不望万户侯

□ 徐问笑

去岁冬天的某个深夜，因看到好友于福建发来的林觉民故居照片，不禁再一次勾起了我对林氏由来已久的一种既崇敬又痛惜的情怀。今人对林觉民的熟悉，多由他的《与妻书》而来，我也不例外。犹记当年，在课堂上诵读《与妻书》时，读至“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时，竟是哽咽不成声。呜呼，斯人之悲，虽时隔百年，然今日我辈者读之，亦有断肠落泪之感。

近代历史风云变幻，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而牺牲于“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孙中山语）的广州起义之中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犹为悲壮和惨烈。为推翻清王朝腐败统治实现民族自由和民主解放，他们以鲜血谱就了一曲“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的大义之歌。七十二烈士牺牲时的平均年龄仅为二十九岁，最小的才十九岁，故孙中山先生曾有“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之痛惜和憾恨。其中，福建的林氏家族中便有三位青年俊彦名列其中，分别是林文、林觉民、林尹民，且牺牲时皆为二十四岁整。

《与妻书》是林觉民于广州起义的三天前深夜所作，从字面上看，本只是一位丈夫写给妻子的信罢了，然而，却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与写信时的复杂背景，兼之“内具豪迈之骨，外饰婉约之表”，使得此信不但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且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不胜感悲。作为一位伟大的无惧流血牺牲的民主主义战士，青年的林觉民同时又担负着他人的儿子、丈夫和父亲等人生角色。在为即将到来的敌众我寡的武装起义积极备战之时，林觉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亲人的死别已然不可避免。对革命的事业他是铮铮铁骨、坚定不移，但虑及到亲人，尤其是想到怀孕的妻子会因为自己的牺牲而承受巨大的伤害与痛苦之时，他却是满腔柔情、百般不忍。试想当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亦曾有“虞姬虞姬奈若何”之挣扎与不舍，所以才有李清照后来的“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之千古兴叹。故林觉民虽“勇于就死也”，但他当日写《与妻书》时的割心之痛，今人亦应能够体会一二。

林觉民出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幼年时便过继给叔父为子。他天资聪颖，幸运的是，其嗣父亦是一位饱学多才之士，林觉民得其悉心抚养与教导，小小年纪便已“崭然见头角”。十八岁时，他与陈意映结为夫妻，虽是奉父母之命，但夫妻二人却是恩爱情深。倘若世道太平的话，林觉民的一生，本应该是优越、从容且安稳的，甚或有一日，才华横溢的他亦能一偿千百年来读书人最为推崇与向往之心愿，领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显达与志得意满。然而，正如他在《与妻书》中所言“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而让林觉民所痛心疾首的“今日之中国”，其时已彻底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故“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

林觉民的聪慧，使得他小小年纪，便对国家的贫弱与民族的不幸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这从他十三岁那年参加科举考试时，却只在考卷上题了“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就直接离开了考场，便足以看出他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已极度不满和痛恨，于他而言，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中国，获取功名亦徒劳无益。这时候的他，已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悲壮现实、戊戌变法的无奈失败，以及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献媚嘴脸，更是让他，以及那个时代所有思图挽救民族危亡的仁人志士，都清楚地认识到，救国的根本却是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家。为唤醒更多国人的救亡和奋发之志，他还常常四处宣传革命之道理。林觉民讲演极具感染力，有一次他参加爱国社活动时，发表了一篇题为《挽救垂危之中国》的演说，讲到激奋处，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全闽大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事后他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林觉民的激进，使得一向对他支持颇多的父亲，亦深觉不安。那时候，清廷对革命党人的镇压与迫害是非常残酷、血腥的，作为一个开明的人士，林父是接受且赞同民主革命之思想的；但作为一位父亲，他又唯恐儿子有生命之危，于是他选择将林觉民送去日本留学。而正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林觉民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且成为福建分会的骨干成员，这也恰恰为他日后能够参加黄兴、方声洞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提供了相应的历史条件。起义失败后，他因受伤力尽被俘。据史载，面对清廷广州将军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林觉民“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以笔立言，立尽两纸，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他告诉两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死也瞑目”。

面对林觉民极具感染力的言谈及其“以天下人为念”的革命者的气度风范，提督李准甚至动了恻隐之心，要知道，死于他手下的革命党人并不在少数，而且此次广州起义若成功，李准亦是首当其冲被枪杀。双方本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而李准独独不忍杀害林觉民，主要也是出于惜才之意。但张鸣岐则认为，这个“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称得上奇男子”的林觉民，即便留下来也无法为清廷所用，如果留给了革命党，实为后患。最终，林觉民与其他被俘的战友一道，被枪杀于广州天字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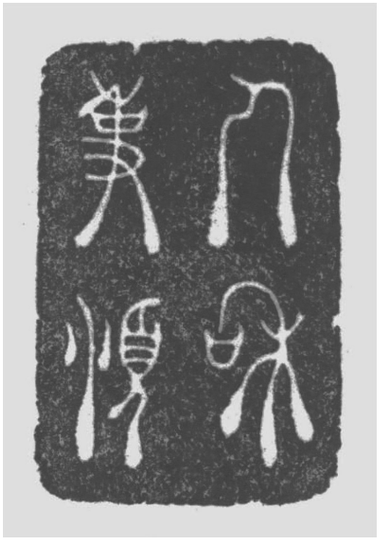
林觉民壮烈就义后，陈意映无法承受丧夫之痛的沉重打击，曾一度意欲轻生。在林觉民年老的父母跪求下，她方强忍悲伤、痛苦地活了下来，但终究因为抑郁寡欢，孩子不足两岁，她便早早撒手人寰，终年二十二岁。我们无法苛责陈意映的不坚强，她亦并非不能理解林觉民为“助天下人爱其所爱”而作出的“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之大义选择，然而，如此年轻的她，亦正处于女人一生中对爱情最为炽烈的年华，因此她的伤痛也必然是悱恻的、刻骨的。更何况林觉民实在过于美好，故而当日的缱绻缠绵绵俨然成了今日的穿肠毒药，她既不能忘却曾经的两情相悦，又如何能够独自承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单与悲苦。

一代伟人毛泽东亦有痛失爱侣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以“我失骄杨君失柳”之句，公开表达了对夫人杨开慧烈士的无限怀念与追思之情。革命成功了，人民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而曾经与自己志同道合、情深意笃的那个人，却天人相隔，这是何等的遗憾与悲痛啊。

捐躯只为殉国难，问平生惟负恩亲，故今日之民主和自由，实乃由血泪浇筑而成的，崇高、真实，且残酷。今人应该铭记历史，感恩英烈们的慷慨就义和奋不顾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年迈的父母，因失去壮年的儿子而老无所依；年轻的妻子，因失去挚爱的丈夫而痛不欲生；幼子失孤，更是犹为可怜，甚或死活难料。冯超骧烈士参加起义时，老父正处于弥留之际，他牺牲后，妻子一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难以为继，最后改嫁远方。小的孩子送人，稍大些的就放任自流，很是凄惨。

而被黄兴盛赞为“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方声洞，其时亦年仅二十五岁。他也有两封绝命书留存于世。其中《禀父书》中第一句便是“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与妻王颖信中则说道：“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再看林觉民的《与妻书》，首句则为“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由此足见，风华正茂的他们皆是抱着必死之决心，唯求“不成功便成仁”。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人和事顺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